

落满蓝蜻蜓的花径

——王小波留下的思维空间

(作者：吴过)

王小波的妻子李银河在接受杨澜采访时，说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事，考虑王小波生前特立独行的个性，李银河想给他找一块与众不同点的墓地，你猜陵园负责人怎么说？“我们这儿公安局长也有，县委书记也有，他们都跟人家一样……”众所周知，王小波生前没有丁点儿同局长书记比高低的意思，按照他的性格，死后也不会念念不忘排座次，陵园负责人是一种误解——因为想排座次的人实在太多。

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总爱胸怀大志，“天将降职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把人这一生趣变成一场苦役，还美其名曰：崇高。中国知识分子的老祖宗们就一直在这么做着，他们的学术路标，始终不渝地朝向政治。孔子忙于参加政治活动，孟子为权势者不听他的忠告而苦恼，墨子毕生在列国间奔走，庄周、老聃似乎好一点，人称大隐，但他们著书立说，仍然对政治抱有极大关注，就算消极性地抨击政治，也证明他们抛不掉政治意念。对于以天下为已任的知识分子来说，有什么比跃登上政治舞台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更让人兴奋的呢？虽然他们的结局往往不妙。放开赵高、秦桧那一类卖身投靠权势的卑劣者不说，即使苏东坡那样高风亮节之人，一旦投身政治当了宰相，也会身不由己，到后来竟屡遭贬降甚至逮捕，就更不用说了，一个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人，被他所尊崇的政治逼到忍辱苟活的地步，实在不只是苏东坡个人的悲哀。

至于谭嗣同、秋瑾、张志新、遇罗克们，为他们所热爱的政治掉脑袋，则是中国政治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双重悲剧。我这么说，也许使人产生误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已任，很好的哇，这是早已明白的道理，就象白纸黑字一目了然。是啊，任何人都可以选择治国平天下的金光大道，这是基本人权，谁想反对也反对不了。让我想不通的有两件事：其一，以天下为已任为何那般狭隘，何以除了政治之途外，其他诸如天文、物理、医术、音乐、文学一类的知识，就只能界定为一技一艺？依我看来，这样的一技一艺，至少比那些庸俗化了的政治高尚。其二，总是企盼担当大任的知识分子往往自我感觉过于良好，他们总认为自己有资格教化于民，可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往往是：知识分子只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经常是需要改造的那一部分，说白了，他们在中国混得很可怜。

摆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有没有另外的道路可供选择？应该说是有的。“他们当中有陈寅恪这样的，以不合作为最高原则，有顾准这样敢于反叛的，有储安平这样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更多像钱钟书这样看透了而‘闭门不管天下事’的，正是这些丰富的知识分子选择，构成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悲欢交替、起落交织的全部人生。”（谢泳：《钱钟书：书生气又发作了》）这些丰富的知识分子选择中，依我看来，至少还应该包括王小波这样自愿放弃“话语权”的“自由派”。

王小波是以沉默的方式开始他另一种选择的。王小波说，把保持沉默看作怯懦，这是不对的，沉默是一种生活方式，不但中国人，外国人也有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了说话的朋友可能不相信我是自愿放弃的，他们

会认为，我不会说话或者不够档次，不配说话。因为话语即权力，权力又是个好意思，所以的确有不少人挖空心思想要打进话语的圈子，甚至在争夺‘话语权’，我说我是自愿放弃的，有人会不信——好在还有不少人会相信。主要的原因是进了那个圈子就要说那种话，甚至要以那种话来思索，我觉得不够意思。……至于沉默的理由，很是简单。那就是信不过话语圈。从我短短的人生经历来看，它是一座名声狼藉的疯人院。”（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

如果从沉默的角度来理解王小波，算已经摸到门槛了。但是，王小波仍然打破了长久的沉默，他生前给友人的最后一封电子邮件中这么说：“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是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所说的一切和我们无关——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值得一说的是，王小波即使“挤”进了话语圈，依然没有丢掉他的本性，依然沉缅于思维的乐趣，王小波认为，一个人只拥有今生今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他选择的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必然要选择的那条路，闪烁人文的光芒，充满浪漫和智慧，他甚至不愿意把那条路看得太过艰难，像个堆积木的孩子，眼里处处看到的是“有趣”。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表白自己：“安徒生写过《光荣的荆棘路》，他说人文的事业就是一片着火的荆棘，智者仁人就在火里走着。……我觉得用不着想那么多。用宁静的童心来看，这条路是这样的：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维特根斯坦临终时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这句话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从牵牛花丛中走过来了。虽然我对他的事业一窍不通，但我觉得他和我是一头儿的。”（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王小波承接了自由知识分子的血脉，引导人们的思维进入到一个快乐的境界，这又是那些前辈知识分子所不可能有的。

王小波向我们所揭示的是个无限广阔的美妙空间，正如哲学家笛卡儿所说：“我思故我在。”这个“在”，是一种美妙无边的存在，当思维不再是一场苦役而是一种乐趣的时候，思想者就像放风筝的孩子，一边松着手中的线，一边发出银铃铛般的笑声。我还想说的是，世界上没有圣人，谁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正确，但这并不妨碍你放胆去想。

顺手举两个例子。第一例：《在路上》的作者、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是“垮掉的一代”的代表，酗酒、吸毒、性开放、沉缅于爵士乐……这样的一个人，却发疯般地迷恋上了东方佛教，他醉心于阅读佛教及禅宗经典，还写了大量有关佛教感悟的手稿，他对佛教的理解是：既然生命无常，因而更需要纵情享受。杰克·凯鲁亚克所理解的那个及时行乐的佛教，同佛教本身风马牛不相及，却并不影响他醉心于此，在这种“佛教”思想的引导下，他写成了《在路上》，几个嘻皮士青年男女横穿全美，狂喝滥饮，吸大麻，玩女人，谈东方禅宗……。第二例：《搜神记》的作者干宝，少年时家中出过几件奇异的事情，有一件事是这样的，他父亲生前宠爱一个侍婢，他母亲很妒忌，便在他父亲落葬时，把侍婢推入墓中，是个殉葬的意思。十多年后，他母亲也死了，因为要把父母合葬，就把父亲的墓再打开，发现那个侍婢伏在棺材上，居然还活着。这样一件事，应用现代科学来解释，无论如何说不通，更大的可能是有人私下串通好了，将侍婢悄悄掩藏下来，只是瞒着干宝

一家人而已。可是干宝却不那么想，他深信鬼神确实存在，于是处处留心鬼神之事，终于写成了《搜神记》。虽然我也不主张胡想乱想，但是举出这两个例子，只是想说明一个事实，即使思维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像俗话说“想歪了”，也不妨碍思维的妙趣横生。对于一个向往自由的知识分子来说，有什么事情比一次妙趣横生的人生之旅更美妙的呢？

胡风案中的两个人物

五十年代发生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一幕触目惊心的人间悲剧，共触及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关于这次事件，已有不少作家撰文著述，作了深刻反思，如李辉先生《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万同林先生《殉道者——胡风及其同仁们》、戴光中先生《胡风传》以及由胡风的女儿晓风主编的《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等，至于零散见诸报刊的文字，更是不计其数。读着这些文字，像是进入一个恶梦，感觉十分沉重，常常喘不过气来。那么多人物，那么多枝枝蔓蔓，纠缠在一起，真叫人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其中，有两个人物尤为引起了我的注意：阿垅和舒芜，他们像一枚铜币的正反面，绝然不同又相互关连，促使我将问题向更深的地方去想。

阿垅：受伤的为什么总是赤诚

被打成“胡风份子”而坐牢的诗人曾卓有一次这么说：“事件发生之后，我最担心有一个人会挺不过去，那就是阿垅，因为他过于赤诚。”（林希：《十劫须臾录》）“过于”二字，活脱脱刻划出了阿垅率直的本性。

追溯起来，整个事件的开头是拿阿垅开刀的。1950年3月的短短一周内，中共中央机关报接连两次批判了这位并非显赫的理论家，阿垅感到难以名状的困惑和苦恼。3月21日，阿垅给《人民日报》编者寄去了一封检讨信，很快，信被发表出来，加了个标题：《阿垅先生的自我批评》，并配发了编者按。检讨信发表了，事情却没有有了结，7月出版的《文艺报》第8期上，刊登陈森的短论，批评阿垅的检讨不能令人满意，还认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也未能更进一步指出他的检讨不够正面、不够深刻的地方”。此事发生之后不久，“胡风在上海与何其芳打笔仗，天津的阿垅，也从一时发懵的窘境中渐渐清醒过来。在朋友们的劝说下，他更加感到针对批评，他有必要写文章向读者解释他的文艺观点，有必要以详尽的论述，撩开罩在自己头上的雾纱。”（李辉：《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

这时候，阿垅开始显现出了他赤诚的一面。据袁水拍在一篇文章中说，阿垅先是写了两万多字的答辩文章寄给周扬，稿子被周扬退回，并告诉他错在什么地方。但是可爱的阿垅并不把那位大人物的意见当回事，不仅不改正文章的“错误”，反而增加了文章的字数，把稿子又寄到报社，要求刊登，并声明不得改动，还要求《文艺报》也必须刊登，他的理由是，《文艺报》转载了批评他的文章，就必须以“同等待遇”。袁水拍在批驳阿垅时说：“当然，大家知道，党是并无平等对待任何意见任何文章的义务，如果是这样，

我们的报纸就成为没有党性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商店了。”袁水拍说得对，当然，大家知道——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谁不知道呢，但是可爱的阿垅，他好象是一个生活在天上的人，似乎并不怎么知道，“袁水拍说，阿垅收到他们的退稿，毫不理睬他们的意见，反而在原有文章基础上，又增加了字数，在10月份又寄到袁水拍处。袁水拍再寄回，告诉阿垅，‘如果拿出达到两个半版面的篇幅来刊登他这样的文章，是不符合《人民日报》的方针的。’仍要阿垅压缩、修改。阿垅在收到退稿的当天，又原封不动地再寄往《人民日报》，‘还是说非登不可’。”（李辉：《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

阿垅倔犟得像个孩子，老是要把他的文章往外寄，并且说“非登不可”，用那个年代流行的一句话说，他简直是把残酷的政治斗争当儿戏。阿垅应该知道他这样做的“严重后果”，但他仍坚持这样做，完全是出自良知，当时阿垅在给胡风、路翎的一封信中说：“我的心境也不是不沉重的。但沉重既过，是兴奋与宁静的时候了。”既知沉重，仍然这样做，不由得让人想起挺着长矛骑匹瘦马的堂吉诃德，为了铲除人世间的和平，那个身穿古代骑士甲冑的人倔犟地走上了不归路，他不怕遭受打击和侮辱，被人关进笼子，也从不失去信心，“干了我们这一行，这种灾难都是免不了的。”堂吉诃德自我解嘲地说。他挨够了打，走尽了背运，遍尝了人世艰辛，也未能把世界颠倒过来，最后精疲力竭，含恨而死。堂吉诃德的悲剧，是一切良知尚存并且愿意用尽全身力气同黑暗奋力一搏的人的悲剧，但是这样的悲剧，在中国，更多遭到的却是耻笑：“瞧这个堂吉诃德！”人们这么说的时侯，堂吉诃德已成了小丑的代名词。多让人寒心啊，理应受到尊敬的，却遭到了嘲笑，如果说堂吉诃德那些荒诞的抗争是悲剧的话，我不知道面对这幕悲剧时中国观众发出的嘲笑声，又是一幕什么样的悲剧。

阿垅的结局很悲惨。他以“反动特务”和“骨干分子”的罪名被捕入狱，1967年，他死在狱中。正如他早期一首诗歌中所写的：“要开作一枝白色的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阿垅：《白色花》）。因思想而获罪，阿垅不是第一人，在他前头有王实味，那个倒霉的人，因为写了篇杂文丢了脑袋，当然，阿垅也不是最后一人，他只是无数蒙难者中的一个。在一个专制的社会里，任何思想都是犯罪，任何思想都带有颠覆性质，思想是危险的，无论对于社会，还是对于思想者本身，既然如此，那么受伤的不是赤诚又会是什么呢？在一个拒绝思想的时代，受伤的总是赤诚，这是一个怎么也绕不开的话题。

舒芜：原来一切如此简单

1950年，舒芜在给他的好友路翎的一封信中写道：“试看今之官们，都是不动笔的，或是十几年前动过笔的，何其可笑！”字里行间，听得见他正直的心跳。然而此后不久，同样是这个舒芜，却站出来反戈一击，将老师和朋友们推向泥沼，成了可耻的背叛者。

如果仅把“舒芜现象”归结为个人品质，那当然简单，但是照我看来，问题恐怕比这复杂得多。

胡风的受冷落，对其追随者舒芜来说是一种强烈的刺激，那意味着他通向未来的路被堵死了，但是，要他做出另一种选择，也不是件轻松的事。终于，他还是写出了这个标题：《从头学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中，舒芜点了路翎的名，赞同《人民日报》对路翎的批评。舒芜将这篇文章寄往《长江日报》，很快被发表出来，几天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舒芜

的文章，并在编者按中首次明确提出了以胡风为首的“小集团”的概念。在这之后，舒芜又写出了《致路翎的公开信》、《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断章取义，罗织罪名，无限上纲上线，将他原先的老师 and 朋友们推向了万丈深渊。在一次奉命赴北京途经武汉时，舒芜对曾卓说：“北京拿胡风没办法，请我去开刀。”据另一名胡风分子绿原回忆：“有一句他（指舒芜——笔者注）讲过多次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真没想到会搞得那么厉害！周扬他们也没想到。’他们没有想到会把胡风集团搞成‘反革命’，这一点大概是可信的。”（绿原：《胡风和我》）两点史料说明一个事实，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舒芜心里是清楚的，但是他没想到会搞得那么厉害，也是实情。关于为什么那样做，舒芜在1997年撰述《回归五四后序》时写道：“解放后我被当作一个思想政治工作的干部来使用，当作知识分子改造工作中的‘改造者’来使用，同时又被赋予‘社会政治活动家’的身分，而不是被摆在‘待改造的文艺界’的地位。这样，我很快就以兴奋的心情学会了新的思维方式，即以政治标准为一切的最高标准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我毕竟不能忘怀文化思想方面的事情，想出版《生活唯物论》，还将《主观论》等系列文章编成一集题为《走向今天》，也想出版，并且也不安心长期留在南宁那样一个边远城市，长期忙于社会政治活动和行政工作，想到京津沪等大城市，静下来专做研究、写作、教学、编辑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把政策当真理，思想教条化，人格政治化，开始了“大义灭亲”；另一方面掺杂一己私利，投靠权势，可以出书，可以调动，可以得到很多实惠……舒芜果然如愿以偿，终于从南宁调到北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原来一切如此简单！正象北岛那首著名的诗篇中所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仅仅只需要那么点背叛，梦中渴望的一切就都能得到。

我原先也是这么想的。在一个社会已经麻木、已经丧失了理智的年代，对于一个失去了良知的人来说，你能有什么办法？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在每个正直者的心里把那些人永远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事实上人们也正是那么做的。舒芜背叛之后，“胡风集团”密友间的通信中甚至不屑于提他的名字，仅只用“无耻”作他的代号。胡风案平反后，1997年，舒芜出于对1955年肢解、篡用私人信件以充当“罪证”的本能反感，再一次引用胡风给他的私信从正面阐发自己的思想观点表示悔意时，胡风的妻子梅志偕同其子女张晓谷、张晓山、张晓风则提出了对于侵权者的控告（见《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三期）。

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也就是说，人们对舒芜没有宽容，甚至不给他忏悔的机会和可能。

将背叛者打入十八层地狱，确实有一种复仇的快感。——原来一切如此简单：人们只需要等待，等到终于有一天，正义之神战胜了邪恶，他就可以站出来分享明媚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不，我还是不能仅仅只这么想。

舒芜是一个有强烈追求自由民主气质的人，1957年，共产党号召人们提意见，舒芜就曾自告奋勇地提了一条：建议允许办同人刊物、同人出版社。这样的观点，同他反戈的那个“胡风集团”的观点有何区别？舒芜被打成右派了，这个“胡风集团残渣余孽”还是没能躲过政治风浪的冲击，踏上了劳动改造的漫长路途。舒芜的悲剧充满复杂性：一个同样是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最后却走向自己的反面，为讨得一点残羹剩饭而投降权势。审视“舒芜现象”，不能不让人深深叹上一口气。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是迫于残酷政治斗争的

压力，如果这个国家的学术气氛稍稍自由一些，舒芜很可能不会走出那一步，我们看到的将会是另一个灵魂充满自由的舒芜。还可以再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舒芜的倒戈，胡风集团的命运又会如何？答案是肯定的：照样逃脱不了覆没的悲惨结局，历史会选择另一个人或者另一群人代替舒芜的位置，换言之，舒芜的倒戈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他只是作了代表而已。这真是一种更深刻的悲剧，在这样的悲剧面前，每个还想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都必须拷问一下自己的灵魂：在某些特定的背景下，你会不会成为另一个“舒芜”？我想那答案多半又会是肯定的。这才是一件更让人伤心的事情。

神农架札记

吴过

那片血一样红的杜鹃花

汽车在进神农架的盘山公路上蜿蜒行驶。沿途，一丛丛杜鹃花正在开放着。

在这般冷清寂寞的地方，杜鹃花依然开放得如此热烈执著，确实是一种难得的操守。

一次偶尔的发现，一分意外的惊喜，心头不由得升起了微微的暖意，同时，车窗外扑面而来的正在默默开放的杜鹃花，也不断地驱使我努力去想一点什么。

人，难免会经常会遇上与此相仿佛的情景：当不公平的命运将你置身在一个冷清寂寞甚至险恶叵测的环境中时，你当然会痛苦，你当然会悲伤，可是你会不会在这样的时候依然热烈执著地开放？你会不会永远这样无声地发出自己带血的声音？

“今年飞来的大雁不是去年的那一只。”这是一个哲学的命题。同理，今年开放的杜鹃花也决不会是去年的那一丛。杜鹃花，在其表面单纯的形式下，每年都有着新的内容，就这样默默地开放，一年复一年，仿佛生命的本来意义就是为了开放似的。所有的痛苦和悲伤在这种尽兴忘情的开放中渐渐淡化成缕缕过眼云烟，让人们去赞叹这些过眼云烟如诗如画吧。杜鹃花，你纯粹而神圣的使命只是在于开放。

在路上

汽车喘着气在爬坡，马上就要爬上华中屋脊——巴东垭了。气温渐渐冷了下来，天空甚至稀稀落落地飘起了雪花，车内的朋友们被五月间的雪花迷住了，一个个不停地发出惊叹。

我却注意到了车窗外的另一道风景：一群身上裹着旧棉衣的乡村民工们，正在辛勤地劳作，他们将一堆堆土块和石子倒在车辙碾过的路上，然后裹裹旧棉衣，搓搓双手，木然地站在公路边望着我们的汽车发呆……。此情此景，象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幅人文色彩浓厚的油画，顿时使我战栗，顿时使我再次想起我们都曾经有过的贫穷与无助。

许多人所以在生活中迷失，往往是忘记了自身的贫穷。“人必须生存到那想要哭泣的境地。”加缪认为生活是荒诞的，但是此时他并不荒诞，仅仅一句话就说中了生命的真谛。

与老伐木工的一席交谈

在神农架，我遇上了一位老伐木工，他的腿上有伤，拄着拐杖，一跛一跛地朝我们这边走来。在公路边，他停下，热情地冲我们笑着，像一个遇上了开心事儿的大孩子。

他的热情和朴素使我感到亲切，仿佛重逢了一个渴别多年的老朋友。

是啊，这确实是我灵魂上的一位久违了的老朋友。

我十分熟悉这些老朋友的故事。六十年代初期，这一代人肩扛理想主义的大旗，从神农架周遭的大小城镇来到了这片原始森林，开始艰辛的创业历程。他们住着最原始的工棚，吃着最粗糙的粮食，却一直唱着最高昂的战歌。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岁月在他们脸上刻下皱折的同时，也在他们心上刻下了深沉的忧伤。

老伐木工说，过去他们的生活是多么快乐啊！然而生活的列车开进八九十年代之后，社会急剧发生了变化，他们中的那些伙伴有的想方设法返回到了先前的城镇，有的则无可奈何地留在了神农架，有时候他们也会聚在一起，那种时刻，无论是返回城镇的还是留在神农架的，都会感叹如今的生活缺少了当年的滋味，都会在心上滋长出一种灰不溜丢的怀旧情绪。

我很能理解老伐木工所说的那些滋味和情绪。不用说，当年他们那一代人的生活是简单的也是极其艰苦的，但是在他们前边作引导的却是一面理想主义的大旗，工棚是简陋的，粮食是单调的，而理想本身是有美感的，为理想而献身的人也是有魅力的。遗憾的是他们最终没有能（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来看也是不可能的）守住自己的理想，心田犹如一片收割之后的田野，由于没来得及播下新的理想，只得留下一片空落落的惆怅。

那么我在想，他们真的不幸福吗？什么是幸福？

人类的朋友

一路上不停地有人唠叨：“还是原始森林呢，连一只小鸟都难得看到！”看得出朋友们脸上的扫兴。在初次进神农架的人们看来，既然是原始森林嘛，当然得有参天的大树，如织的古藤，最好是出现几个在电影中所看过的镜头，阳光照射下的树林中，一群一群温顺的野兽正在自由自在的散步……。

是的，是有一群一群温顺的野兽正在树林中自由自在地散步。人类的这些朋友们，它们一边在我们目光所不能及的地方散步，一边隔着遥远的距离端详着另外一个动物群落——人类。有谁曾经认真地审视过自己呢？如果换一个位置，也就有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我甚至听到了森林深处，人类的这些朋友在看见人类的庇斑和霉点时所发出的讥讽的笑声。

夹缝中的温情

人多么期盼温情啊，尤其在他陷入绝境的时候，即使最坚强的斗士，也难脱俗。老诗人、“胡风分子”曾卓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夹缝中写给妻子的一首诗中说：“一捧水就可以解救我的口渴/一口酒就使我醉了/一点温暖就使我全身灼热……”这种让人掉泪的诗句，正是悲凉心境真实的写照。但是

——我多么不希望有这个但是啊——现实中的情景却让人沮丧，政治运动来了，人们更多看到的却是诬陷、告密、背叛、落井下石、幸灾乐祸等，更叫人痛心的是，有时候，这些甚至来自他们的亲人，比如顾准。

温情还是有的，只不过生长在夹缝中，被挤压得变成了畸形，近读老作家荒芜《伐木日记》，感受尤深。《伐木日记》写一个 129 人的伐木队中的几个人，他们都是右派，“朝雪斧声，夕灯人语”，文字中透出脉脉温情，象冰天雪野中几朵温暖的黄花。毕三姐，一个研究高能物理的研究生，她害怕使用锯子，原因是小时候见故乡城隍庙墙上画有地狱壁画，有一幅画的是两片木板，夹着一个罪犯，被恶鬼锯着，血随着锯齿流下来，可怕极了。后来她又读过一部明人笔记，其中说朱元璋也用那种办法锯人，不过不是竖锯而是横锯。因此，她每次拿起锯子，就联想到那种酷刑，不寒而栗。这么柔弱的一位女性，在对同样是右派的作家荒芜聊天时说：“你们有一支笔，一叠纸，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写东西。处境越困难，生活越艰苦，越能写出好作品来，象屈原那样，杜甫那样。可是我们呢？”——柔弱的温情中夹杂着追求理想的坚强和刚毅，仅管也有无奈。“郇子手”，一个歌剧演员，在一幕歌剧中扮演过郇子手的角色，更要命的是他不适宜地说过，要杀尽一切贪官污吏，因此获罪。“郇子手”只不过是难友们对他的谑称。这个死不悔改的人，寒气凛冽的夜晚还溜到树林深处去唱《卡门》，据说，他在日记中发泄了对现实的不满，于是队部发动批判，造成伐木队轰动一时的“日记事件”，其实，日记中只是如实记下了他的家庭悲剧，一件是他主动提出和妻子离婚，和女儿脱离父女关系，因为不那样做，他的妻子就要失业。另一件是他的半残废的老妈妈，被遣返原籍，因为感到孤独无靠，终于自杀。庆幸的是，“日记事件”后，“郇子手”并没有成为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瘟神，仍有人惺惺相惜，同他暗通款曲，在小河边，在工棚背后的松树林里，隔三五天，就到老地方谈心，象两个年轻情侣似的……。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他们在道义上是一致的，他们没有被打垮，生活还是在这里进行，人性还是在这里闪烁。这里除了一个带队的解放军班长而外，大家都是‘右派’，是同难者，这里大家都是平等的，尽管是屈辱的苦难的平等……这里的冷酷死寂的生活中，时时有着美好的温暖的东西，顽强地生长出来。”（荒芜：《让伐木者醒来》）有一个右派，没到北大荒来，被遣返原籍，接受群众监督，生产队里的脏活重活全由他干，连五六岁的娃娃都能向他指手划脚，他听说北大荒的右派平起平坐，羡慕得什么似的。吴大姐 14 岁的儿子，因为爸爸妈妈姑姑叔叔全是右派，在学校里受同学欺负，被叫做小右派，这个孩子决心到北大荒来奔父亲的丧，外公外婆扭不过他，又怕管紧了出事，只好让他来了，到北大荒后，他又决心到伐木队来同母亲住在一起生活，伐木队为他破了不准家属探亲的例，允许他以小客人的身分住下来，“我爸爸死了，妈妈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我到这里，不是作客，是回家。”可是就在全队快要完成冬伐任务下山前几天，这个孩子被狼群吃了……。读此节时，正是六月的天气，可是我后背上却透着一丝刺骨的寒气，身体一阵发冷。一个孩子，只有在受难的人群中才能找到一点温情，而为了得到畸形的温情他失去了生命，这该让人感到多么悲哀！仍以那些受尽苦难的伐木人为例，我常常想，如果他们不是生活在同类人中，比如说放回到原来划他们右派的环境里吧，别说温情，怕是连活下去的权利也不会有。

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在残酷的政治斗争缝隙中搜寻本属于我们这

个文明古国的温情，一次次总是失望而归，这是为什么？是的，在张贤亮先生的小说《绿化树》中，描写过马樱花式的温情，那种来自“人民”的温情，曾经让章永磷们感动得痛哭流涕，“我虽然在这里度过了那么艰辛的生活，但也正是在这里开始认识生活的美丽。马樱花，谢队长，海喜喜……虽然都和我失去了联系，但这些普通的劳动者心灵中的闪光点，和那宝石般的中指纹，已经溶进了我的血液中，成了我变为一种新的人的因素。”重读小说中的这段话，使我心中一阵刺痛，拉开历史舞台的帷幕，章永磷们是以罪孽深重的赎罪者形象出场的，那么马樱花式居高临下的温情也就显得宝贵，甚至她不时地嘲笑和讥讽，也象冬日里一缕和煦的阳光那么可爱。张贤亮先生是我所敬重的作家之一，他在后来的创作中写出了如《我的菩提树》、《习惯死亡》那样具有强烈批判锋芒的小说，实在是对《绿化树》中温情的一种强有力的超越。在一篇题为《我作为作家的生活》的演讲词中他说：“其实，我和大多数中国作家一样：我们既勇敢，又懦弱……我们习惯了政治的风风雨雨，我们并不吝惜个人的生命，但同时又习惯于为了民族的国家整体的利益和声誉而不断地妥协；当我们在客厅里大胆地高谈阔论的时候，我们却又要小心地把厨房的门关上，以免妻子听见后向我们发脾气。”既勇敢，又懦弱，这话说得实在很高明。

有人说，中国文人是一群缺钙的软体动物。这话说得尖刻也深刻。历次残酷的政治运动，使他们的精神空间越来越狭窄，放开那些卑鄙的告密者、诬陷者不说，放开那些转而向权势寻求“幸福”的风云人物不说，甚至放开那些因为一点可怜的思想而获罪的一般蒙难者不说，即便从他们中寥若晨星的优秀人物来看，依然是差不多所有人都真诚地认为自己犯了错误，灵魂需要长时间艰苦的改造。真是一次规模空前的集体无意识。

“千万朵葵花向太阳”，在鲜血一般疯狂的红色海洋中，向日葵们昂起了头，朝着同一个方向转动。只是，当太阳落山黑暗降临之后，向日葵们不得不低下头颅，但那并非陷入深思，仅仅是一种失落。这样的一群，他们早已没有了高贵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鄙弃他们，自有道理。如果碰上有良好的知识分子扪心自问的话，一个不能坚守的人，也是不配享有民间的温情的。

毕竟，温情还是有的，只是它在夹缝中艰难地生长，难为人知。顾准在他最需要温情的时候，温情没有光顾，他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下显示了人的强大。说起来让人伤感，他挚爱的母亲，由于亲人的作梗而不准相见；他挚爱的妻子，由于可以想到的原因先是同他离婚后是自杀；他挚爱的儿女，一直不想见他，甚至在他弥留之际也不原谅他——因为他给那个家庭带来了太多灾难。在这样的背景下，顾准仍然没有退缩，我想在他灵魂的最深处，应该存在一块温情的土壤的，我理解的这块土壤，就是对真理的爱。凭借那点温情的滋润，他坚持说出了自己的声音：“不许一个政治集团在其执政期间变成皇帝及其宫廷。”“我还是厌恶大一统的迷信。至于把独裁看作福音，我更嗤之以鼻。”“我憎恨所有的神。”他的六弟陈敏之在一篇谈顾准的文章中说：“当知识分子尚未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的时候，任何先觉者的对抗话语，都是大夜中的呓语。”是的，顾准说的是天上的声音。我还想说，天上的声音总会有被人理解的一天。顾准的女儿顾淑林在读完她父亲的遗稿《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后写下《迟到的理解》，文中说道：“它是如此汹涌澎湃，深深地激荡着我的心。原有的父亲形象，至此彻底地清晰高大起来。骨

肉情感，对动乱年代和家庭变迁的痛苦回忆，成年以来对文中所及问题的思考，以及严酷的自我剖析，所有这一切，纠缠在一起，多少个夜晚不能成寐。”在“不能成寐”的“多少个夜晚”里，一定有温情浸泡着她，也许那些温情有时会变换一下形式，长出牙齿，一点点啃她的心灵。如果说顾淑林是顾准的女儿，她的话带有感情因素的话，可以再举个我自己的例子。在读顾准时，好多个地方都忍俊不禁眼眶潮湿，仿佛看见寒夜中的几点星光，心上笼罩起一丝暖意。相信我的这点感受决不至于是孤证。我同顾准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也无高攀的意思，而且我知道，在顾准被思想界普遍认可的今天，我这么说会有媚雅的嫌疑，但还是允许我说上一句：温情决不仅仅只是存活在我的心中。

是的，温情在夹缝中艰难地生存着，它只对我们这个民族中最坚强的灵魂绽放出花朵般美丽的笑靥。

有一种写作姿势

吴过

有的人天生就不会向这个世界妥协，比如前苏联红军大尉索尔仁尼琴，在战斗中表现勇敢，对自己和下属要求严格，遵守纪律，还曾荣获过两枚勋章，这么一位红军军官，按道理百分之百应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继续沿着仕途的阶梯一步步往上爬。可是他不，后脑勺里面的那块反骨作怪了，对当时的最高政治领袖斯大林，索尔仁尼琴很看不惯，更糟糕的是他把看不惯转换成行动，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指桑骂槐批评了斯大林，谁知这封私人信件被苏军反间谍机关发现，1945年2月，索尔仁尼琴被捕入狱。

被捕之后，经过了两年多的监狱集中营生活，他看到了斯大林统治下更多的黑暗，这个很早就已经倾心文学的人，在他最倒霉的时候拿起了笔，要真实地记录下这一切。

命运之神赐予的一次厄运，引导索尔仁尼琴走上了另一条人生的道路，正如他在自传体长篇随笔《牛犊顶橡树》一书中所写的：“如果不是把我拘禁起来，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的。”

一个人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还会想到写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索尔仁尼琴也知道自己写作的意义：“不仅不会有人出版我的作品，就连一行字也需要我付出头颅作为代价。”这种一手提脑袋一手拿笔的写作姿势，世界上恐怕不多见。当听到那些生活有保障的名作家在广播里唠叨，如何养成良好闲适的写作习惯，应当怎样在工作日一开始便集中精力，他疑惑不解；当看到那些目睹过阴暗年代的作家想一溜而过，不告诉读者主要的真理，只是说些鸡零狗碎，想用舒缓的油膏粘住人们的眼睛，这时候，索尔仁尼琴不再只是疑惑不解，他简直愤怒了：“他们，这些有地位的作家，不受威胁的作家，干吗这样胆小怕事？”

索尔仁尼琴把他当作家的经历比喻为地下工作者，在《牛犊顶橡树》中他写道：“我们不敢公开地说和写，向朋友们诉说我们的心头所思所臆和事情的真实情况——我们甚至不敢相信‘纸张’，因为斧钺依然悬在我们的颈上，随时都有斧起头落的可能。”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当一名地下工作者似的作家也有“优越性”，他的笔是自由的，既不需要想象书刊检查官，也不需要想象编辑大人，除了真理，再也没有什么在他头上回荡。在《牛犊顶橡树》中，索尔仁尼琴甚至还用一段优美舒缓的文字描述过他那些日子里的生活片断：“我在距离高级僧侣方舟般的小房只有十米远的地方散步，周围是参天的千年古老椴树，有三年时间的朝朝暮暮，每天我都在树下踱步，幻想着遥远的光芒四射的自由——在另一种光明的年代，在天色大亮的国度。”

就这样，整整12年，他平静地写个不停。到了第13个年头，也就是1960年夏天之后，苏共22次党的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向斯大林发起了猛烈激昂和突然的冲锋，代表们生动有趣的发言象久违了的客人，忽然出现在索尔仁尼琴面前，让他感到兴奋和战栗。但是同时，他也在文学刊物上读到了这样的一些瞎拍马屁的诗句：“应当感谢严厉的父亲”、“斯大林同战斗的钢铁是同一种元素”、“发生过的一切就让它过去吧”等等，索尔仁尼琴觉得该轮到自己发言了，他选了一份稿子送到当时影响很大的《新世界》编辑部，然后激动不安地等待，不是象一个贪图功名的年轻作者，而象是一个不慎留下痕迹、被咬得浑身是伤的老囚徒。

这篇稿子后来给索尔仁尼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但是当时的情景却颇为复杂：稿子丢在编辑的桌上，无遮无盖，默默无闻，直到有一天，一个名叫安娜·萨莫依洛夫娜的女编辑收拾桌子，拿起来读了几句，凭直觉断定这份手稿乱丢在桌上不妥，于是把稿子带回家中，读完后很受感动，她又将稿子传给另一位女编辑阅读，这之后，稿子便由她们两人共同推荐，辗转到了《新世界》总编辑特瓦尔多夫斯基手中。

写过著名长诗《焦尔金游地府》的总编辑特瓦尔多夫斯基是个复杂的人：一方面他是苏共党的领导人，是无限忠于斯大林、为斯大林的死痛不欲生、永远相信和传播他心目中纯洁的真理的那么一种人；另一方面他是个优秀的诗人，有良好的艺术鉴赏能力，是仍然具备艺术家良心的一位总编辑。在两个女编辑的一再催促下，一天晚上，特瓦尔多夫斯基躺在床上，顺手拿起了这份手稿。可是读过两-three页之后，他就认定这样的东西是绝对不能躺在床上阅读的，他起了身，穿上衣服，家人都已经睡了，而他却整夜不合眼地读着无名之辈索尔仁尼琴的作品。

后来的一切似乎都还算顺利，特瓦尔多夫斯基读完手稿，像一个淘金者那样狂喜，激动得浑身发抖。他让人把作者叫到编辑部里，抑制住内心的兴奋，提了几点修改意见，然后和颜悦色地对索尔仁尼琴说：“我不敢完全保证作品一定能出版，也说不准出版日期，但是我会竭尽全力促成出版的事。”这篇名为《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小说手稿，后来甚至被送到苏共当时最高的政治领袖赫鲁晓夫手上，赫鲁晓夫吩咐给政治局常委每人复印一份，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赫鲁晓夫让人念了小说中的片断文字，当场拍场说允许出版。于是，索尔仁尼琴的这篇小说，成了赫鲁晓夫手上反斯大林的一块砖头，重重拍到了斯大林分子的后脑勺上。

从地下工作者到浮出水面，索尔仁尼琴经历了角色的转换，当赫鲁晓夫决定出版他作品的消息传出后，一些文学报刊和电台的编辑纷至沓来，有的要求采访，有的索取签名，有的向作者约稿，面对热闹非凡的非文学的场景，索尔仁尼琴没有任何狂喜的浅薄相，他拒绝了所有报刊电台的约稿，继续默默无声甘当地下工作者。当《新世界》另一位副总编提出要对他那篇《伊

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进行修改，增加作品“光明面”时，索尔仁尼琴断然否决：“我已经等待了10年，我还可以再等待10年。我并不着急，我并不靠文学维持生活，把手稿还给我吧，我离开这里。”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索尔仁尼琴平静地说道：“整整一生都教我更多地面对逆境，我以比较轻松的态度，有准备地相信恶劣的状态。早在劳改营中我已经深刻领悟了一句俄罗斯谚语：‘不要相信幸福，不要害怕灾祸！’”

这种写作姿势是很特殊的，世界上那么多作家，可是像索尔仁尼琴那样特立独行的写作者并不多见。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即使在获得显赫的声名之后，他依然像金翅鸟爱惜自己的羽毛一样爱惜他的写作，将大部分作品掩藏起来，藏而不露，秘不示人，像是珍藏着一件件稀有的玉器，总想要打磨得更漂亮些。这让我想起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奇诺在《法兰西遗嘱》中的一段话：“自由化以后的第一个表示，就是几乎所有俄国人都开始把隐藏在记忆深处的、那些从前犯禁的东西，都拿出来公诸于众。但他们不知道历史不需要如此众多的小恩小怨的文章，只要有一篇宏篇巨著，堪称经典之作，也就够了。”

索尔仁尼琴特立独行的写作姿势，在他获得197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后再一次显现出来。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科学院一向被指责为政治色彩过重，前苏作家蒲宁193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遭到了被苏联当局永远驱逐出境的报应；另一位前苏作家、《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前苏《新世界》总编辑特瓦尔多夫斯基和七名编委联名给《文学报》写信，指责帕斯捷尔纳克“玷污了苏联作家和公民起码的荣誉和良心”，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了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协会员籍，并要求政府褫夺他的苏联公民权。帕斯捷尔纳克因福得祸，不敢到瑞典领奖，发表声明：“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的用意所作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份已经决定授予我的、不应得的奖金。”同时恳求苏联当局不要把他驱逐出境。现在索尔仁尼琴再次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又将会去如何面对？

索尔仁尼琴说，1958年他正在小镇上当中学教员，听说帕斯捷尔纳克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后，他羡慕得不得了，但后来听说作家不敢去领奖，他为帕斯捷尔纳克感到羞辱：“怎么可以惧怕报纸的辱骂呢？怎么可以在放逐的威胁之下怯懦，低三下四地恳求政府原谅？张口结舌地承认自己‘错误和迷惘’，承认在小说中表达了‘自己的错误观点’？怎么能仅仅为了不被放逐，而背弃自己原本的思想、自己的精神呢？”这次轮到索尔仁尼琴获奖了，他采取了同帕斯捷尔纳克完全不一样的姿态，当即给瑞典科学院发了一封回电：“我认为把诺贝尔奖金授予俄国作家，是对俄国文学（当然不是苏联文学）和我们痛苦的历史所表示的崇高敬意。”同时借助这个高潮着手修改他的大部分作品，如《古拉格群岛》（三卷）、《第一圈》（96章）、《没有十二月的十二月党人》、《坦克了解真情》以及劳改营长诗……。索尔仁尼琴并非不知道他这样做的后果，这意味着将被堵塞回国的道路，但是他说：“我可以出版全部作品，说出我全部要说的话。”

世界上有很多作家，写作姿势也千姿百态，有为金钱的，有为女人的，有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有为发泄的，有为爱的……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人，他的写作是生命本身的需要，换句话说，他们是用生命进行写作的，比如索尔仁尼琴，比如卡夫卡，二人不同的是前者写作的锋芒所指的是外部世界，后者的写作则更多指向人类的内心世界。由于写作是生命本身的需要，当预料到

写作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伤害时，他们不是停止写作，而是把写作转入地下。

这样一种写作姿势，象是让人难忘的雕像，看上去很美，但真正要做起来又谈何容易？索尔仁尼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 1973 年，他的另一部重要作品《古拉格群岛》（第一部）在巴黎出版，这时候，苏联当局决心对他采取断然措施，1974 年 2 月 12 日以叛国罪将他拘捕，次日宣布剥夺他的苏联国籍，强行装入飞机押解出境，这位作家也开始了他没有祖国的流亡生涯。在处境最困难的日子里索尔仁尼琴说道：“上帝啊，保佑我在遭到打击时能够忍住疼痛！不要让我从你手中跌落！”是的，所有用生命进行写作的写作者都有必要问一下自己：你在遭到打击时能够忍住疼痛吗？你会不会从上帝手中跌落？